



干部训练与边疆建政： 民国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

张 冉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既隶属于国民党干部训练工作体系，又因其地处边疆而独具特色。在干部训练的具体实践中，蒋介石希望通过省训团训练效忠于中央的干部，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则力图通过省训团使受训干部形成一个稳固的组织，防止中央势力对地方的渗透，以实现其边疆建政的愿望。最终，西康省训团训练了大批的干部，他们在促进地方建设、加强民族融合、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新成立的西康省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建设。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干部训练；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刘文辉；边疆建政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6.017

收稿日期：2021-02-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2017 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川康军人、第三势力与国共政争(1932—1949)”(17FZS022)、四川师范大学校级一般项目“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6YB2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2021 年度课题“干部训练与边疆建政：民国时期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XNZZSH201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冉，男，河南南阳人，四川师范大学党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E-mail: 412187026@qq.com。

由于黄埔军校学生在东征、北伐中核心力量的发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逐渐确立“训练重于作战”^①的战略思想，并随着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 年 7 月至 1937 年 7 月)、峨眉军官训练团(1935 年 8 月至 9 月)以及中央训练团(1938 年 7 月至 1946 年 7 月)的开办，训练对象也逐渐由军事干部拓展到地方党政干部。1939 年 9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各地开始实行新县制。为了配合新县制的推行，同年 11 月，行政院颁布《县各级干部人员训练大纲》，由中央训练委员会(简称“中央训委会”)会同内政部督导各省在省、专区、县设立省训练团、区训练班、县训练所，训练所谓“行新政”的“新人”^②。

1939 年元旦，根据重庆国民政府的命令，西康省正式建立，省府设在康定，刘文辉任省主席，辖境“东至雅安金鸡桥与四川省分界，西至金沙江与西藏隔江而守，南至会理、宁南与云南相邻，北至石渠与青海接壤”，共 33 个县和 3 个相当于县级单位的“设治局”^③。为稳定川边局面，有效控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

①《南岳军事会议手订各项要则及第一期抗战之总评》(1938 年 11 月 28 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5《演讲》(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 年版，第 554 页。

②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6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2 页。

③王川《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 页。按：西康省政府成立时，重庆陪都时期的国民政府划归西康省政府管辖的有 46 个县和 3 个“设治局”，由于金沙江以西的 13 个县尚处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控制之下，西康省实际仅辖有 33 个县和 3 个相当于县级单位的“设治局”。

的雅属、康属和宁属地区^①,刘文辉推行“以政翼教,以教辅政”的施政方略和“德化、进化与同化”的民族政策,通过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加强对西康干部(包括土司头人)的培养和使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在1941年6月至1946年12月间举办^②的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简称“西康省训团”)。

按照《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组织规程》,该团“为省训之执行机关,直隶于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③,而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则为西康省县“各级干部人员训练之设计指导及考核机关,直隶于中央训练委员会及内政部”^④。因此,西康省训团既直属于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又直隶于中央训委会及内政部。而实际情况则是,虽然中央训委会“对各省训练工作并力谋整理推进,以期达成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目的”^⑤,但是“蒋介石希望通过训练分化地方异己势力,而地方实力派则千方百计避免属下势力被蒋介石的干部训练及收买分化瓦解”^⑥,省训团实际成了中央与地方势力角逐之地。因此,以省训团为视角,洞悉各方势力的角逐,成为很多学者的关注点,但却忽视了省训团在培养地方干部、巩固地方统治、推进地方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绩^⑦。本文拟依据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考察西康省训团的训练情况、省主席刘文辉对省训团的控制以及受训学员回到地方后的实际表现,对以往学者研究中所忽略的省训团对地方建设的影响作一分析探讨。

一 西康省训团的创办及训练概况

有学人指出,“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的干部训练风气即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主要关键角色正是党内派系”^⑧。无论是中央拥蒋派系,还是反中央的地方实力派,均积极开办干部训练班,以充实自身实力。但这一情况并不符合国民党当局高倡的“领导集中、一致抗日”的策略精神。故中央训委会在成立之初,即以“训练求一致、精神求一贯、组织求统一”为工作目标,以“掌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的思想训练事宜”^⑨为主要工作内容,要求全国各党政军机关举办各种训练事宜,其训练班次开设、组织实施方案等均需由中央训委会“核准备案后,方得开始办理”^⑩。培训开班后,其规章制度、教员及学员名册、训练考核等,均需报中央训委会备查。因此,西康省训团在组织机构建设、教员和学员遴选、培训班次设置、训练方案实施以及训后联络等方面,与同时期其他省份的干训团在形式上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于西康省民族众多,刘文辉利用省训团加强了对民族地区干部(土司头人)的训练,故西康省训团又有其自身的特色。

在组织机构方面,省训团设团主任一人,由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兼任,总理全团事务;设教育长一人,由省保安副司令王靖宇兼任,承团主任之命,负全团训练的实际责任;其下分设“秘书室、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军训大队部、省直属区党部、三青团支部等部门”^⑪,负责训练具体事宜。

①雅属、康属、宁属大致相当于现今的雅安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参见:丹珠昂奔等主编《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

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于1946年7月将中央训委会撤销,隶属于中央训委会的各省地方干部训练团也随之撤销。

③《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组织规程》,《西康省政府公报》1941年第58期,第20页。

④《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组织规程》,《西康省政府公报》1941年第58期,第19页。

⑤《七年来之训练工作》,《训练专刊之十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1945年编印,第3页。

⑥黄宗华《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⑦既有关于国民党干部训练团的研究,主要有冯启宏《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干部训练:以中央训练团为中心的探讨(1938—1945)》(台湾政治大学史学系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化贯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干部训练研究(1939—1949)》(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黄宗华《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曹淑瑶《台湾省训练团之研究》(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孟静《民国河北省训练团评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张荣杰《四川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评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栾家庚《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龙《西北干部训练团研究(1939—1945)》(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对国民党各级各类训练团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有一些成果对省训团的评述还十分精到,这些都为本文的研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既有研究对参训学员回地方后的工作表现及其对地方建设的影响的讨论还略显粗略,对此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⑧冯启宏《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干部训练:以中央训练团为中心的探讨(1938—1945)》,第217页。

⑨张宏儒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⑩《中央训练委员会统一各地训练机关办法》,《训练月刊》1940年第1卷第5期,第134页。

⑪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42页。

参训学员以调训和考训为主,调训对象主要是在职公务、医疗、教育人员。如省政府、屯委会及县级机关的股长、科长、职员,乡镇长,中小学校长,各级警务和卫生医务人员,保安、军管区少校以下职员,康保族上、中层人士,以及党团、司法干部,县参议员和人民团体骨干等。第五期由于“现职人员其应调本团受训者已达三分之二”,故本期学员决定以“考训为主,调训为辅”原则^①,以“普通考试”名义,分别在成都、雅安招考了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约200人入团受训。同时,要求该期调训学员必须是男性,年龄在18—50岁之间,身体健康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贪污、无劣行,公务及保安人员须年终考绩在60分以上,须具备中等以上学校毕业或在地方公务机关服务满三年以上者,康保族受训人员须能通晓汉语者^②。

培训班每期500人左右,根据受训人员入学前的工作性质划分为专业教学班组,计分为民政、财政、教育、户政、保干、兵干、战干等班组,与政府部门的民、财、教、建、军相配合。培训时长初为两个月,第八期开始改为一个月。

训练内容包括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军事训练、业务训练和训育实施五个部分。政治训练与精神训练占全部训练时数的20%,军事训练占15%,业务训练占35%,训育实施占30%。其中,精神训练以总理遗教、总裁训示及精神讲话为中心,结合西康省实际、新生活要义与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采取约请高级长官及名流学者作讲话或讲演、纪念周(或纪念日)训话、分组谈话及课程讲授的培训方式,“指导其思想行动,激励其为社会服务之精神,革除颓废腐化之积习,养成革命之人生观”。政治训练以抗战建国纲领及西康省施政纲要、新县制及国际情势等课程为主要科目,采取集体训练、个别训练和补充训练的培训方式,使学员养成热心负责的精神,成为建设新西康之中坚干部,以加强抗战建国的力量。军事训练严格按照军事化管理,采取正规教育、内务教育和机会教育的培训方式,使学员能具备军人的一般知能,并能实际应用。业务训练根据学员职务上必须具备的知识与技能,予以专业课程之讲授,并注重实际问题之研讨,以班组为单位,采取课程讲授、专题研究、小组讨论、调查报告、业务演习、专业训练、示范与参观及实验的培训方式,以使学员对于本身工作范围内每一问题均有深切的体认与解决方法。训育实施分集体训育、组别训育和补充训育。集体训育通过小组讨论、工作讨论、座谈会、特种演讲、各种竞赛、党团务活动、体育指导等方式进行;组别训育则通过个别谈话、生活指导、读书指导、自我训练与批评的方式进行;补充训育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临时社会与劳动服务、训育谈话、编印刊物、合作指导和个案指导。学员结业时举行总考核(学科成绩占50%、训育成绩占40%、军事成绩占10%),以60分为及格线,“不及格者,或予留级训练,或予默退,不得给予毕业证书,并须造具学员姓名成绩清册,层报上级机关备查,一面根据成绩加其考语,通知各该员服务机关知照”^③。

第一期训练结束后,西康省训团在雅安设立“西康省训团毕业学员通讯处”,各县设联络站或直属通讯组。通讯处每月发给各个联络站办公经费,并规定学员每月写“读书笔记”1篇,联络站按月汇报学员工作动态1次。凡在各地工作之省训团学员,都必须到当地联络站报到,由联络站按其工作单位和居住区域划编小组,进行联系,对失去工作的尽量安排新职。

自1941年6月1日第1期开学至1946年12月奉令停办,历时5年半,西康省训团共举办11期培训,先后设立了20多个专业教学班、组,“结业学员共约四千五百人”^④,包括汉、藏、彝三族,分布全康各级党政军、省司法、临时参议会、工矿企业等部门。从整个组织架构上看,西康省训团与其他各省省训团无异,这是由于刘文辉“限于实力,不敢‘分庭抗礼’”^⑤。但他深知在他所直属的任何部门中,如果有蒋介石的嫡系人员插手,对他就大有妨害。因此,刘文辉通过扩大学员规模,加强对学员的教育与管理等控制手段,来抵制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渗透。由于受训人员多,分布领域广,西康省训团成为中央与地方势力角逐的焦点。

二 以边疆建政之需引领干部训练的方向

①《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三十二年度第五期训练实施计划》,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02,第7页。

②《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受训学员调训办法(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修正)》,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01,第4页。

③本段所述训练内容,详见:《西康省各级干部训练暂行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01,第37页。引文中的所谓机会教育,即“凡军人所应具有之初步知能,于正规教育所未及者,皆尽量利用机会以弥足之,使其修得一般技能之要领”。

④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42页。

⑤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43页。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四川定位为“僻处西陲”之地^①。随着华北局势的紧张和红军长征进入四川,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四川为首的西南腹地。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峨眉创办军事训练团,“旨在对四川、云南和贵州的军官进行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②。1939年,随着新县制的推行,在各省设立省训团以训练地方干部,以期达到受训人员“忠于领袖、忠于蒋介石”^③的训练目标。但是,在训练干部信仰和服从谁的问题上,上下并不是铁板一块,各地方实力派为维护自己对地方的控制,各有自己的考量。作为中央与西康地方势力角逐的焦点,西康省训团从边疆建政的需求出发,在课程讲授、学员精神与组织控制等方面多头并举,采取有效措施以抵制中央对地方的渗透,巩固地方自治。

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根据自己多年军队管理和施政经验,对干部政策有自己独到的认识,认为“要建设新西康,必须建立广大优秀的干部,来推行建设的工作”,而且“要使选用的优秀干部,长久保持其优良的本质起见,就非加训练不可”^④。因此,作为西康省训团主任,刘文辉对开办省训团特别认真,“不但过问人事安排,甚至一句标语口号也要亲自设计和推敲”,例如在省训团外墙上的标语,一边是“拥护蒋总裁复兴中华民族”,另一边是“拥护刘主席建设新西康”,而在办公室门外屋檐上“按规定挂‘公忠廉勇’的横额,他叫人换成‘卫国经边’四字”^⑤。通过显而易见的标语,时时刻刻提醒学员:忠于蒋介石就是忠于刘主席,忠于刘主席就是忠于蒋主席,以求达成地方自治与边疆建政的目的。

不唯如此,刘文辉还通过向学员授课及谈话的方式建立师生情谊,拉近与学员的关系。每期开学以后,所有新学员在操场上排列整齐,刘文辉逐一点名,以此显示其对学员的重视;被点到名的学员,则认为自己的名字被省主席记住,无形中就拉近了刘文辉与学员之间的关系。在训练过程中,刘文辉每周对学员进行一次精神讲话,每次讲2小时,讲话的内容围绕刘文辉建设西康的方略,把“建设三民主义的新西康之全部理论和实施办法,作个较为有系统的说明”^⑥,以此勉励学员奋发努力,开辟边区,建设新西康。每期训练结束前夕,刘文辉还分别召见学员,询问受训心得、今后愿望以及工作情况等。一般是5人一组,被列为“优秀学员”的则单独接见,个别谈话,直接进行考察,列入升迁行列,增加学员的向心力。结业时,每个学员都发给写有刘文辉训条“在艰苦中奋斗、在远大处立志、在平实处用功、在领导下行动”^⑦字样的横幅一张,作为学员的座右铭,要求学员在其领导下行动,不得逾矩。学员回到工作岗位,还喜欢给刘文辉写信,汇报当时当地发生的人和事。刘文辉专门安排了两位秘书,负责拆阅学员来信,并将信中的要点分类摘录,送给他审阅;同时授权秘书,除十分重要的由他作决定外,其他均可直接用他的名义回信。所以,发信者多半得到了回信,学员也就乐于给他汇报情况了。于是,刘文辉的耳目遍布全省,消息极为灵通。

西康省训团的其他教官,也积极配合刘文辉,加强对学员效忠省主席意识的培养。教育长王靖宇经常对学员讲,“我们要在团主任领导下行动,团结一致,发扬省训精神,不然就会受欺负”;教务处长韩文畦在给学员上课时也说,“现在人心不古,爱搞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互相倾轧”^⑧,以此暗指国民党中央对西康省的离间和渗透,达到引导省训团学员效忠刘文辉的目的。

学员在省训团受训期间,需要提交《学员调查表》,填写诸如“你佩服的师长是谁”、“你钦佩的长官是谁”、“你不高兴的人是谁”、“你将来的志愿是什么”、“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之观察”、“对于实施新县制之意见”等信息^⑨,不仅可以体现学员个人思想和认识状况,也可以呈现学员属地的政治和社会情况。而最能体现了解地方政情、民情的,莫过于学员的讨论会。西康省训团第四期民政甲组在讨论“如何使教育人员确实协助推

① 黄天华《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页。

② 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喆、李惟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123页。

③ 黄宗华《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第52页。

④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的干部政策: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在西康省府纪念周上讲词》,《康导月刊》1944年第5卷第11/12期,第1、4页。

⑤ 张永春《回忆刘文辉治康片断》,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8辑,甘孜报社印刷厂1989年印行,第90—91页。

⑥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06页。

⑦ 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47页。

⑧ 张永春《回忆刘文辉治康片断》,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96页。

⑨ 《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学员调查表》,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19,第40页。

行管、养、卫各政”时,该组学员就梳理到未能协助推行庶政的原因:“各县地方教育与地方自治,仍是分头办理,各不相谋,在形式方面,亦多未依法组织,行政推动,更无教育人员参加,而精神方面,甚有政管人员,互相仇讎……何能奢谈合作,希望协助”^①。学员在讨论中对地方情况的引证,为省府了解地方提供了便利。

训练期间,“凡在省训团任职、任教的省政府厅长、处长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参加省训团的训练工作,给学员以与其主管领导接近并建立师生关系的机会,以利于尔后的升迁”,并借此训练机会,“考察受训人员的意志是否坚强,生活能否艰苦,对事业是否有理想,对国家是否有抱负,将来能否肩负建设新西康的重任”^②。训练结束后,省训团把学员的综合考评、分数与等级评定等情况,送达省政府和各主管机关,作为学员任用的依据。因此,省训团的干部训练,一方面为政府用人提供了初步依据,另一方面也给学员创造了晋升的机会。正如刘文辉所说:“求才异省不但数量有限,不足分配,且如沙里淘金,苟非独具慧眼,必难识别真才,不如自己设班培训,不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干部,且彼此建立了师生情宜(谊),感情相通,休戚与共,使用起来,既能得心应手,且亦不怀二心。”^③大有把省训团办成“他的干部养成所”^④之势。

在对西康省训团学员进行精神训育之外,刘文辉也通过唯行学社加强对学员的组织控制。1941年元旦,唯行学社在康定成立,社长刘文辉,副社长王靖宇、李先春,主要人员有韩孟钧、张缉、宋钰、杨致中、张练庵、杨露等。成立之初,只在康定吸收一批中上层人士参加。在西康省训团开办后,王靖宇便“在受训学员当中大量发展,作为进一步统治学员思想的工具”^⑤。唯行学社只须两个社员的介绍并填写《社员入社申请表》,便可批准入社。由于王靖宇主持省训团工作,训练团的党团负责人均是其下属,因此受训学员几乎全部加入了学社,社址也由康定迁到了雅安省训团内。学员回到原单位后,唯行学社还会“酌量各县人数多寡,分别筹组分社或编设直属小组,以利社务推进”^⑥。每年元旦则在省训团举行纪念活动,加强社员联谊。学社围绕“致知与力行”、“精神修养及其事业”、“唯生论的组织观”、“知行体系”、“唯行的历史观”、“由正心修身说到笃行”等专题,编辑出版了两期《唯行论集》,发给社员研读。

学社名义上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以及蒋介石的唯行哲学为基础,倡导“行的哲学,行的人生,知行合一”,要求社员“努力研究唯行理论,阐发总理遗教、总裁言论,躬行实践、转移颓风,以尽个人对抗战建国应负之责任,不达目的,决不终止”^⑦。但是,其“吸取唯物论、唯心论的精华,合而为一,用唯行论的行动实践理论”,逻辑混乱,缺乏说服力;社员又沉迷于追名逐利,入社是为了攀关系,奉迎上司,多数对学术理论一窍不通^⑧。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其成果乏善可陈。

然而,唯行学社原本就是“表面上以钻研学术相标榜,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政治性质的集团”^⑨,其学术研究的薄弱并不影响其政治影响的发挥。由于蒋介石对刘文辉一直是心怀疑忌,“蒋怕刘尾大不掉,刘怕蒋消灭异己”,因此,刘文辉“就宁愿多发展一个唯行学社社员或多训练一个规矩听话的省训学员,既能扩大自己的声势,又更巩固自己的墙脚”^⑩。唯行学社遂成为刘文辉“假研究学术之名,行网络各界人士,树立地方势力之实”^⑪的工具。唯行学社也因此在省训团的影响力超越了国民党和三青团。

除了加强对在团学员的组织外,为把受训结束返回地方的人员组织、团结在刘文辉的周围并在其领导下行动,第一期训练结束后,省训团即在雅安设立“西康省训团毕业学员通讯处”。由刘文辉、王靖宇分任正副

①《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四期各班组业务讨论总结论》,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 242-01-0005,第 4 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政协雅安市委学习文史联络委员会编《回忆西康》,雅安凌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6 年印行,第 29—30、27 页。

③冯有志《西康史拾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15 年版,第 95 页。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政协雅安市委学习文史联络委员会编《回忆西康》,第 28 页。

⑤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6 辑,第 148 页。

⑥《致李先春》,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 242-01-0010,第 2 页。

⑦《唯行学社社员入社志愿书》,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 242-01-0010,第 19 页。

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政协雅安市委学习文史联络委员会编《回忆西康》,第 31 页。

⑨彭迪先主编《刘文辉史话》,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5 页。

⑩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6 辑,第 149 页。

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政协雅安市委学习文史联络委员会编《回忆西康》,第 30 页。

处长,下设秘书、组织、总务、指导4个小组,林泽仁、杨露、杨致中、宋晋成分任组长,各组设干事1至2人,由省训团学员兼任,各县则设联络站或直属通讯组,公开挂牌活动。从1941年10月到1946年12月,西康全省先后设立了33个联络站,平均每县1站。

正、副站长均由王靖宇提请刘文辉委派当地较有政治、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的学员担任。被派任者即以此为媒介,直接同刘文辉和王靖宇建立联系,汇报工作情况和社会动态。1946年,西康省训团奉令停办,“西康省训团毕业学员通讯处”遂改名为“西康省训团毕业学友会”,以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将原来只限于学员的组织,扩大为凡在省训团任职、任教人员均可参加的社团。其管理人员与“西康省训团毕业学员通讯处”基本相同,各县联络站也一律改为学友分会,“学友会对学友分会布置的工作和规定事项,与通讯处没有两样”^①。

以上情况表明,“西康省训团虽是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下属,但因刘文辉只利用其外部形式,把它办成地方色彩很浓的政治学校”^②。正因如此,受训人员在西康任过县长的有30多人,任国大代表的有10余人(占西康出席代表的四分之一),任省参议员的有8人,任议长、处长、学校校长等的更数不胜数,“从省到各县、区、乡的各部门,无不有省训人员充数其间”^③,而省训学员“一有风吹草动,都以省训系统积极投入拥刘行列而奔走呼号,虽实力不足而声势不小”^④,有效地促进了刘文辉对西康地方的统治和建设。

三 以干部训练之效推进边疆建政

抗战期间,为培养适应建设后方、支援抗战的干部队伍,西康省训团在课程设置之初,即有意识地在基础课程上将增强学员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知识融入到课程及考试之中,开设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防要义”、“国际现势与敌情研究”、“西康宗教”、“康藏史地”等科目^⑤,考试内容涉及“世界历史”、“中国史地”、“国内政情”、“西康省情”等方面^⑥。边疆地区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学员通过学习,了解到国家大势、民族情况,增强了学员的区域认同、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学员邓德杰(藏族头人)不仅创办了康藏贸易公司,推动了巴塘、德格等地与英国、印度的贸易往来,促进康藏地方与海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他还资助阿旺嘉措“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述西藏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⑦,以图实现国家的统一,充分体现了其强烈的国家观念、民族认同感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态度。

在业务训练课程设置上,以提高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为主要目的,分设必修课和专业训练课程。必修课程包含“本省施政纲领及行政计划”、“地方建设”、“行政管理”、“新县制概论”、“公文处理”、“粮食管理”、“应用统计”等科目^⑧,专业训练课程设置则突出行业特色,如民政组的“保甲户籍概要”,财政组的“赋税总论”等科目^⑨。课程讲授之外,省训团也注意以专题研讨的形式,激发学员对施政问题的深入思考。比如西康省训团第四期民政甲组在讨论“如何使教育人员确实协助推行管、养、卫各政”时,该小组人员根据议题,分三步进行问题梳理:首先,探讨教育人员应协助推行庶政之理由,“用教育的方法,去激发其抗战情绪,灌输其抗战智能,并培养其国家民族的浓厚观念,以争取抗战的胜利”;其次,陈述现在未确实协助推行庶政之原因,在于过去乡镇保甲人员“多无智识能力,为教育人员所不齿”,“行政教育,分途办理,彼此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各县督导制度,多未健全”;最后,提出解决该问题之办法:1.实行依法组织,要求行政人员兼主教育,教育人员兼任政务,并“须切实服务”,2.实行政教合一,要求行政人员与教育人员竭诚合作,3.厉行督导和训练,4.改善教育人员待遇^⑩。学员在研讨的过程中,顺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集体讨论、研判,既

①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51页。

②张永春《回忆刘文辉治康片断》,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97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政协雅安市委学习文史联络委员会编《回忆西康》,第30页。

④张永春《回忆刘文辉治康片断》,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94页。

⑤《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三十年度训练工作计划草案》,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01,第22-23页。

⑥《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试卷》,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18,第1、3页。

⑦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人物志(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⑧《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三十年度训练工作计划草案》,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01,第26-27页。

⑨《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三十年度训练工作计划草案》,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01,第27-28页。

⑩《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四期各班业务讨论总结论》,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训团档案,案卷号242-01-0005,第2、5-8页。

增强了学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个人能力的提升,也加深了学员相互之间的了解,为日后工作上的协作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大多数学员“因接受严格训练而日即于高明,这便是办理训练机关成绩之所在,只要大多数的公务人员,都变好了,又有少数的特殊优秀分子,居间倡导,久而久之……增强干部的功效,便很大了”^①。通过训练,学员的家国意识得到增强,工作能力得到提升,回到工作岗位之后,能有效地推动边疆建政工作的开展。

比如西康省训团粮政班的学员,“大都在西康崭露头角”,许多人“一直在西康省、县级粮食部门工作。直至西康解放都还有不少人被留用粮食部门”^②。省训团的举办,既为地方建设培养了实干人才,推动了地方工作的进展,同时又开启了雅安用电照明的历史。西康省训团筹备之初,因“开学在即,急需照明用电,建设厅只得派技术人员筹设了一个小型火电厂”^③,随着1941年6月1日省训团的开学,开启了雅安用电照明的历史。

与其他省训练团不同的是,西康省训团一直注重对藏族、彝族人员的训练,在省训团内专门组建了“康族民政组”(当时公私文书都称居住在西康境内的藏族为康族),调集康属20个县的民政干部80人入团受训,结业后仍回原岗位工作,“从此省训学员,及于藏族”^④。藏族学员八美次登在受训后回到县上,先后任康族特种保安中队长、候补参议员、副乡长等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八美次登“在维护社会治安,调节纠纷,带领群众进行开荒生产等方面作了不少的工作”^⑤。彝族学员岭光电入团受训后回到当地,“一方面在家乡兴办学校,一方面又寻找机会输送彝族青年外出受训”^⑥,由于他所到之处均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并资助彝族学校办学、学生向学,被誉为“彝族中的‘教育派’”^⑦。七期学员金乌伍哈(汉名“朱德修”),“在生活、工作中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作风正派、严于律己,不仅是勤政廉洁的模范,而且是民族团结的模范”^⑧。正是由于这些省训学员回到民族地区,宣传、践行国家认同理念,从而加强了汉、彝、藏各族之间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加速了少数民族融入国家社会的进程。

通过培训,多数学员对刘文辉产生了信任、依赖。面对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散布“西康械争迭起,秩序混乱,局势不稳”的谬论,刘文辉命西康省训团学员、学友会理事、国大代表高秉鑫予以驳斥,高即在《西方日报》第3版头条发表《西康国大代表高秉鑫谈雅属近况》,对王陵基散布的谣言予以驳斥,用具体事实澄清了谣传^⑨。刘文辉在起义之前,为使部属思想有所认识和准备,由王靖宇亲自秘密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吸收保安系统和西康省训团学友会的中、上层骨干参加。该会“翻印马列主义书刊和毛主席著作,并由会员执笔撰写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文章,制成小册子,在会内秘密散发阅读”^⑩,同时要求“省训学友们作好起义准备,举起起义旗帜,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敢有异动,后果必将追究”^⑪,把省训学员团体的约束力、制裁力一并使用来稳定社会秩序。

1949年12月13日,“驻雅之党政军机关、法团、学校、军保部门约2000余人,在雅安西康省训团大操场,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宣读起义通电,宣布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废除国民党政

①刘文辉《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致词》,《康导月刊》1942年第3卷第12期,第2—3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政协雅安市委文史联络委员会编《回忆西康》,第476页。

③冯有志《西康史拾遗》,第294页。

④冯有志《西康史拾遗》,第100页。

⑤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巴塘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⑥李仕安口述、马林英撰写《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⑦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⑧《布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布拖县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2页。

⑨陈强立《我所经历的川康民革地下工作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四川省雅安地区印刷厂1987年印行,第20—21页。

⑩王德全、毛云相《西康保三团和川康人民革命军第一纵队起义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3页。

⑪吴林泉《挺进西康先锋团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四川省雅安地区印刷厂1989年印行,第61页。

府法统及其一切法律、法令,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①。这是西康省训团在1946年底完成训练任务之后的最重要一次亮相。这一次走向人民阵营的亮相,大概也是对西康省训团干部训练的一种形式上的肯定。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曾对刘文辉讲:“你训练部队还真是很有成效,我们改造起来很费了些劲。”^②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刘文辉训练干部的成效。

西康省训团的开办,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方党政干部的履职能力,有利于省府了解地方、加强对地方干部的管控和对民族地区的治理。虽然西康省训团名义上是按照中央规定办理,实际上是刘文辉笼络各族各界人士入其彀中的场所,使全康的公职人员都成为其学生,从而建立起“既是长官与部属,又是师长与学生”的双重关系^③。这些学员回到地方之后,在促进地方建设、加强民族融合、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新成立的西康省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建设,实现了“文有省训团学员,武有军训团学员作骨干,推行以卫为中心之政,稳定了西康”^④。

四 结论

从省训团筹备到最终停办,刘文辉“对于蒋系人物,能拒绝的就拒绝,不能拒绝的就以客礼相待,虚与周旋,或者‘敬而远之’”^⑤。国民党派驻西康省的某厅长级官员曾造谣刘文辉发动省训团学员种植鸦片,王靖宇以通讯处的名义向全省各县联络站发函,“要求他们写信给那位官员加以驳斥。于是,不到半月,那位官员的办公室,就收到很多驳斥他的信件。不久,即被迫离开西康”^⑥。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虚与委蛇,反映在省训团上,于地方是为了巩固统治,于中央则是削弱了统治。因此,国民党欲借干部训练“收编”及“中央化”西康省地方势力的效果并不明显,省训团实则成了刘文辉“培植他的核心力量,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工具”^⑦。

刘文辉通过扩大省训团参训学员规模,利用课程讲授、单独接见、组建唯行学社等方式,与参训学员建立起广泛的“师生之谊”,使所有参训学员均是刘文辉的“门生”。学员回到地方后,刘文辉又通过各级学友会、各地联络站等组织来维系与学员的“师生情谊”。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时认为,中国是一个以身份取向的社会,在科层体制中更体现了一种呈垂直状态的“权威—依附模式”,这种模式产生的行为特征之一,即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那种埋头注重于人际关系网的趋势”^⑧。通过这种既是长官与部属,又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刘文辉有效地控制了地方干部,而地方干部也以省主席“门生”这一身份为荣。

正是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受训学员回到地方之后,贯彻刘文辉地方治理思想和举措的力度就更大。这也是西康省训团学员能够在促进地方建设、加强民族交流融合、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即便如西康省训团这样对学员控制比较有效的省份,其学员中仍然有“首鼠两端”,遇有风吹草动便“望风附焉”的行为者。张星石回忆说,葛绍武、葛荫堂父子之所以在盐边独霸一方,就是“因为葛荫堂曾到刘文辉所办的西康省训团受训,一九四五年我到盐边时,他曾找我用密电码电刘文辉表示拥护。以后又利用其他渠道与西昌行辕挂钩,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⑨。更有关键时刻转投他方者。如盐源张玉麟曾在省训团受训,通过省训团关系,跟刘文辉比较接近。在伍培英(刘文辉女婿)起义前夕,张玉麟“认为当时胡宗南和贺国光在西昌的力量比伍培英强,伍培英不能取胜,因此他没有答应(同伍培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政协雅安市委学习文史联络委员会编《回忆西康》,第66页。

②刘世定《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政协雅安市委学习文史联络委员会编《回忆西康》,第27页。

④李启明《原西康省训团与康定联络站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委编《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康定印刷厂1988年印行,第114页。

⑤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43页。

⑥张永春《回忆刘文辉治康片断》,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95页。

⑦杨露、张永春《回忆西康省训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42页。

⑧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60页。

⑨张星石《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概况》,政协凉山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凉山日报印刷厂1986年印行,第165页。

英一起起义)”^①。因此,这种所谓“师生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针插不入、水滴不进”的关系。受训学员在短期内因私人情感的维系确实为新成立的边疆省份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党内生态未改变之前,蒋想藉由某些新设组织——如三青团或中训团——来团结党内同志,使之齐一步伐,显然不如想像中来得容易”^②。以此视角来看西康省训团,结果是何其相似。

Cadre Training and Borderland Governance: A Study on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Cadre Training Group of Xika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ZHANG Ran^{ab}

(a.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e, b.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g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cadre training group of Xika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ubordinate to the Kuomintang cadre training system, was quite unique because of its location in the borderland.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adre training, Chiang Kai-shek hopes to train cadres loyal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rough the provincial training team, while Liu Wenhui, chairman of Xikang Province, tries to make the trained cadres a stable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provincial training team to prevent the central power from infiltrating the local area so as to establish his governance in the borderland. In the end, a large number of cadres trained by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cadre training group of Xikang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They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border areas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Xikang Province.

Key words: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cadre training; local administrative cadre training group of Xikang Province; Liu Wenhui; borderland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张星石《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概况》,政协凉山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66页。

^②冯启宏《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干部训练:以中央训练团为中心的探讨(1938—1945)》,第64—65页。